

唐人街:新的观察与解释

綦淑娟

唐人街,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景观,吸引了众多社会学研究者的目光。继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三十年代的著作《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在国内翻译出版之后,最近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敏的新著《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又在国内译出(《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周敏著,鲍霭斌译,23.5万字,商务印书馆1995年11月出版)。经过六十年的时空轮转和社会经济变迁,唐人街早已旧貌换新颜,它的新发展所昭示的理论和实践意涵给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空间。作者正是从这里出发,以纽约唐人街为个案,展开了她对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唐人街发展道路的研究,并提出结构条件与文化特质并重的民族聚集区经济模式来试图对之做出新的解释与评价。

关于处于异民族、异文化、异经济之中的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的研究,在国外社会学界可谓汗牛充栋。概括其理论模式,周敏认为典型的有同化模式、民族文化模式和民族聚集区经济模式三种。同化模式基于“大熔炉”理论,认为处于同一大社会中的各种民族群体,无论其国家、种族、民族背景,都要进入经济和社会的主流,在教育 and 职业方面取得成就,才能赢得社会的认可。而大多数移民都要经历一个先进民族聚集社区,从事最差的工作,然后逐渐沿着社会经济阶梯向上爬,陆续从原来的民族社区搬走,住进环境较好的居民区,更多地接近白人群体,逐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和主流社会成员日渐相融的过程。因此,移民社区终有一天会瓦解,民族隔离是暂时的,民族交往会使得独特的民族性最终消失。民族文化模式基于多元主义理论,认为各种不同民族的移民群体可以按各自不同的适应方式同时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这种理论并不否认最终同化的可能性,但是它认为移民是很难被同化的,由于各种独特的文化价值观的生命力和外界社会的压力使移民通常以民族群体的形式在主流社会中形成聚落,民族团结精神能帮助移民群体应付作为移民身份的特殊处境,能通过组织必要的集体力量来创造在经济上发展的机遇。这种集体的居住、生活、生产方式反过来又强化了民族群体的独特文化特征。但是这一理论又指出,这些民族群体最终会被主流文化所同化,不过,这一过程并不一定要首先放弃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第三种理论模式,也是作者较为推崇并在本书中予以展开运用的“民族聚集区经济模式”。这一由美国社会学家阿历翰德鲁·波特斯提出的理论模式认为存在一种少数民族移民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另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它强调,在民族群体成员的社会流动和获取地位方面,民族经济和民族社会网络能起很重要的作用。该理论包括经济和文化两种成分。从经济角度讲,这一模式把民族聚集已看作是大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劳务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自主的民族聚集区经济结构,从文化角度讲,通过家庭、亲属网及本民族的社会机构的作用,移民群体的文化共性、民族团结精神都能促进民族聚集区的经济发展。这一理论认为移民团聚在民族聚集区内并不意味着同化的失败,相反,民族聚集区经济的发展通过给移民提供就业机会和文化庇护,使移民获得了进入新的社会阶梯的资本和财富,从而为移民融入美国社会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方式。

在对这三种模式的分析对比之后,作者认为 1965 年之后唐人街独特的发展道路适应于用“民族聚集区经济模式”来分析。按照作者的见解,1965 年以后的唐人街并不像许多研究者所经常指出的那样,是移民求生的权宜之计和藏污纳垢的贫民窟,而是一个朝气蓬勃、繁荣兴盛的华人移民聚集区。之所以是“民族聚集区”而不是“民族聚居区”,作者意在强调唐人街的经济性,即它并不是如“民族聚居区”那样集中居住着穷苦人和新移民以及他们所从事的简单经济活动,而是以民族企业及其民族雇主、雇员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心地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唐人街作为一个民族经济聚集区,通过调动民族资源并利用外部资源,为中国移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开拓各行各业的民族企业,使得投身于其中的华人移民获得财富资本和地位资本,从而为其融入美国社会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因此,唐人街不是华人移民的跳板,而是他们生活、奋斗获得各种资本进而融入美国社会的场域。这是全书的论点所在。

为了论证其中心观点,作者考察了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华人移民对唐人街的影响及唐人街如何促使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机制。1965 年以后,由于社会政治的微妙变化,美国改变了其对华人歧视的移民政策,大量的华人涌入美国。与第一代贫穷、无知并抱有临时侨居信念的华人移民相比,新移民具有文化素质高、携带金融资本、以定居为目标的特征。正是这些显著不同于以往移民的特征和潜在华人文化网络的作用,使得唐人街发生了质的变化。按照民族聚集区经济模式经济结构与文化这两个主要关切点,可以将作者对这一变化作用的论证分为两个方面。从经济结构层面看,移民政策改革后纽约唐人街的经济由自给自足的小型附属性经济变为一个崭新的、稳固的、实力雄厚的民族经济聚集区的原因可以归结为:(1)大量移民的涌入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对本民族消费品、服务需求的巨大增长;(2)来自港台大陆的富商、中产阶级带来相当数量的金融资本;(3)具有不同文化资历的移民提供了素质较好的人力资本,涌现出一批企业家、专业人士和技术熟练工人。这些方面的变化为原来单一、附属性低档经济上升为一个包括餐饮、制衣、金融、珠宝、房地产、零售批发、旅游等行业高级分工、多样化、专业化的经济体系提供了市场支撑。作者提出“准二元结构”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经济体系的特征。所谓“准二元结构”是指在唐人街民族经济中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业,一类是受保护行业,一类是外向型行业。前者是受民族聚集区保护的拥有自己独有的金融市场、劳务市场和消费市场,而对本民族的消费和服务需求的,在华人社区之外不易找到的行业。这些行业包括餐饮业及其它服务业,主要由小企业组成,但并不一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一些高级的知识密集型行业如医生、律师等也属此列。后者指拥有外族市场,填补大经济的空缺,不具有前述三个民族市场的行业,在唐人街内制衣业就是典型。这些行业和大经济体系紧密相联,具有不稳定的特点,而且必须和其它民族进行激烈竞争。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为华人移民开创独立的就业机会,他们可利用单一民族劳务市场的优势发展自己的事业,避免身心由于参与外部大市场竟争而受到伤害;另一方面通过外向型行业的发展增加与大经济的接触,唐人街民族经济超越了简单附属经济的特征而成为大经济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

正如葛兰诺维托(Granovetter)所言,经济活动是嵌入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唐人街经济成就的取得也是与它所嵌入其中的华人文化体系的推动作用分不开的。作者贯穿全书的另一个重要观点便是构成华人文化网络的关系资源、社会资本对其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功能。关系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产物和概念,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模式贯穿于中国人的行为中,便是以与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处世行事。移居到美国的中国人将这样一种文化观念也带到了美

国,“关系”便成为移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可靠资源。作者指出,有三种可供华人移民利用的关系资源,即家庭、宗亲和社区经纪人,它们构成移民个人的关系网络,在移民的迁移、就业、融入的各个过程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移民的迁移表现出链式迁移的特征,迁移者从其“关系”方得到关于迁入地的信息及迁移过程的资助等。而到达迁入地之后,迁移者由于语言、信息及民族歧视等方面的原因,必须依靠其家庭、宗亲、同乡社团的帮助寻找工作,借以开始新生活的第一步。而唐人街的华人企业对工人的招募也从不登广告,而是通过其掌握的“关系资源”来获得求雇工人的信息。移民站稳脚跟后在美国谋求发展也离不开其关系资源的协助、提携,因而唐人街的企业大多是家庭小企业或由兄弟、姐妹、父子、同乡等合作开办的公司。不仅如此,这种关系资源从个人经过一个模拟过程,逐渐扩大范围,至社区、至同乡进而至于整个华夏民族,便成为“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是指一种处于异文化环境中以民族认同、民族自尊、民族团结为基础,调动民族资源,提高民族整体地位的精神和素质。正是这种社会资本的作用,民族经济聚集区中受保护行业其金融资本在本民族市场中稳定的周转,而很少流到民族社区之外;尽管企业规模小,内部竞争激烈,转手率高,但绝不会败落到外人手中,也不会被大经济所吞并。其外向型行业的发展也是为了从外部获得收益来投资、扩大受保护行业,民族聚集区内很多餐馆老板曾经都做过制衣业老板,现在正做制衣业老板的人则想通过这一行业积累资金将来开餐馆就是例证。民族人力资本、消费市场的需求亦是如此。由是,形成了纽约唐人街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对华人移民个人来讲,由于唐人街民族聚集区经济条件和文化网络的共同作用,他们在此比在大经济中能够获得较快的地位提升和资本积累。尽管他们出现了分化和流动,一部分人成为具有相当财富和良好地位的企业家和中产阶级,而另一部分人成为依靠辛勤劳动积累财富,希冀将来成为个体经营者的工人,但是这两部分人都会将自己的积累投资于下一代的人力资本开发,使其子女能站在一个更为平等的起点与人竞争。因此,可以说正是唐人街民族聚集区经济使华人移民走上了新的融入之路。

然而,唐人街的繁荣发展也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问题,即随着唐人街不断扩大,华人移民居住日益分散化。那么,这是不是经济衰落的先兆?或者华人移民的减少会不会导致这一聚集经济的衰退乃至消亡?作者对之的回答是否定的。她再次强调民族聚集区的强大整合力和文化网络的重要作用。由于唐人街地价上涨,不断分散开住的华人移民并没有因此而疏远了原来的社区,而是新到一处就形成一个新的卫星唐人街,并和老唐人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唐人街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在不断扩展。对于后一问题,首先移民人数零增长的假设并不现实。其次,民族聚集区经济的发展不仅与此有关,而且与美国大经济的发展有关。任何一种经济结构不会是永远存在的,重要的是有新的企业取代旧的企业。最后,作者重申唐人街这一个案的意义在于它告诉人们少数民族在经济上融入社会的途径不止一条,要消除陈旧观念,重视在民族同化、融合过程中民族文化网络的独立作用。

综上所述,作者通过详实的资料和调查分析,运用民族经济聚集区模式切实把握了近年来唐人街发展变迁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功能,堪称为国际移民研究领域的一朵新花。但是这本书仍存在美中不足之处。其一,如本文开头所述,吴景超先生可谓唐人街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尽管这本书中大量引用美国人的文献,却只字未提吴先生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其二,书中过于强调唐人街整合、秩序、团结的一面,而对其企业间竞争、劳资冲突、帮派斗争或一笔带过,或略去不述,这显然有损于作者论点的信度。其三,论及唐人街经济崛起的经济条

件与文化两个因素时,由于没能涉及唐人街内各种社会组织、社团的作用而显得琐细、零乱和不全面。尽管如此,瑕不掩瑜,这本书仍以其新颖的观点、详实的资料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

责任编辑:张宛丽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研究》第七期出版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袁方主编《社会研究》第七期已于月前出版。本期内容主要分为7个部分,共约12万字。

1. 社会学学科建设:费孝通等几位学者在1995年全国高校社会学系主任联席会上的发言,主题是当前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以及对于市场经济的适应问题。

2. 纪念已故社会学家陈达先生诞生100周年:与会学者在纪念会上的演讲稿。

3. 学术演讲:费孝通教授在两次学术会议上的演讲,以亲身的学术经历,对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历史作了回顾与反思。

4. 专题论文:李国庆和应星分别从理论层面评述了日本社会学家福武直先生的农村社会学理论与美国学者库恩的“范式”理论;谢立中对当代中国社会垂直结构变迁的探索;陈伯敏和蔡文眉调查了新疆的农业移民情况;郭崇德的论文论述了中国社会保障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程为敏探讨了英国福利国家实践对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启示;杜勤等人则对残疾人高等教育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周星的“灯与丁”是一篇民俗学论文,剖析了“送丁求子”这一类看似寻常实则深刻的富于人类学含义的民间习俗。

5. 其它包括北大社会学系93届硕士、博士论文简介、北大社会学系1995年对外合作与学术交流概况等。

(张)